

2002 年海内外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

柯 惕

笔者所见 2002 年出版的图书：郭汝瑰、黄玉章编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1 月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张海鹏、步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月出版的《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李秉新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4 月出版的《血色冀中》；齐春风著，人民出版社 5 月出版的《中日经济中的走私活动》；高晓燕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6 月出版的《东宁要塞》；杨玉林、辛培林主编，黑龙江出版社 7 月出版的《细菌战》；谢忠厚、李昌远、申玉山、李翠艳撰写，人民出版社 8 月出版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型——彭真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与实践》；刘宝辰、林凤升合著，河北大学出版社 8 月出版的《日本掳役中国战俘劳工调查研究》；（澳）乔治·希克斯著，滕建群译，新华出版社 10 月出版的《慰安妇》；程兆奇著，上海辞书出版社 12 月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等。

2002 年举行的学术会议主要有：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韩国学术团体协会、韩国纠正日本历史教科书运动总部团体协议会、日本战争责任研究资料中心、日本 21 世纪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主办，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协办，3 月 28 日—30 日在南京召开的首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由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

办,6月27日—29日在哈佛大学召开的“战时中国:地方政权与状况1937—1945”学术研讨会;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学会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2002年8月14日—15日在北京召开的“七七事变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由美国日本侵华研究会、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9月29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抗日战争遗留问题与中美关系暨在美兴建日军侵华浩劫纪念馆研讨会”等。

仅以所见学术著述,对一年来研究状况评述如下。

一 中国大陆的相关研究

(一) 日本侵华研究

关于日本侵华研究,以往多注重实证方面而忽略理论方面的研究,而徐勇的《两战间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及其对外扩张理论》(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则比较深入地对日本侵略扩张理论进行分析。有人认为日本存在军国主义而不存在法西斯主义,该文则明确提出法西斯主义不仅在二三十年代已经在日本兴起,而且它“不仅改变了日本社会政治,更提出了一系列侵略理论,强化了近代军国主义确立以来的对外政策,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多方面作了社会动员与理论准备”。该文把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区分为民间的和军队的两个类别,指出:“借对外战争实现其大陆政策,同时反击民主派势力,这是军部法西斯与民间法西斯势力的主要契合点。”该文还提出日本法西斯扩张理论,“既有对传统武士道、日本主义、天皇中心论等思想的兼收并蓄”,也有“一批现代法西斯理论家、活动家针对时局提出各种论述,以及军部各决策机构制定策案纲要所确认的指导思想,表现五花八门,极富于诡辩性、多样性、独特性、应用性与丰富性。”这些论述,有助于人们从

理论上了解近代日本何以成为侵略国家的原因。

史桂芳的《试析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的侵略理论》(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则具体地分析比较了几种典型的日本侵略理论的内容。文章提出:“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国内有许多侵略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认为:“这些理论在实现日本独霸东亚、称雄世界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其手段有所不同。东亚联盟论主张以王道为指导,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为条件,建立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论则主张以协同主义为指导,用协同主义代替中国的民族主义;大东亚共荣圈则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名,扩大侵略,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文章还分析了这些理论的实践情况,指出:东亚联盟不仅限于理论阐述,而成立了东亚联盟协会,形成了东亚联盟运动,汪伪集团也参与其中;东亚协同体论者的昭和研究会在日本新体制运动开展后,参加了大政翼赞会;而大东亚共荣圈论则被日本政府直接表述为基本国策。这些分析,对于人们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以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期间战略策略演变,提供了较新的视角。

冯伟的《“从满蒙领有论”到“大东亚共荣圈”——对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再认识》(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既是对日本侵华理论的研究,也是对日本侵华策略的研究。文章考察了“满蒙领有论”和“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形成、内容和范围的演变,分析了两者的内在联系,结论指出:1. 从占有“满蒙”变成建立“满洲国”,是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实现整个扩张计划而作的策略调整;2. “大东亚共荣圈”的内容和范围,并非一成不变,其演变同二战前国际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3. 和赤裸裸的扩张计划相比,“大东亚共荣圈”不仅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特征,而且是日本各种侵略扩张的综合体现。

张生、卢文华的《日本侵华模式初探——以“华北事变”为中心》(载《民国档案》2002 年第 2 期), 虽然是以分析日本侵华模式为主要内容, 但却另外提出了一个引人注意的观点即: “自明治维新以迄抗战前夕, 日本主流文化对其文化母国中国的观感一言以蔽之: 蔑视; 对中国的欲望也可以用两个字概括: 侵略。” 文章还引据福泽谕吉和大川周明的言论论证这个观点。给人以启示的是, 这种分析实际表明, 日本近代侵华理论中包含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容。

实证研究仍为日本侵华研究的主要内容, 新成果较多, 其中引人注意的有以下几种。

关于日军细菌战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七三一部队, 也有研究涉及南京一六四四部队, 而由于史料的缺乏, 华北一八五五部队的研究一直不能深入。谢忠厚的《华北甲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之研究》(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1 期), 则利用中央档案馆档案, 填补了这一空白。该文对一八五五部队的始建、本部及分支机构、细菌试验及细菌作战罪行的基本情况做了比较详实的介绍。文章披露, 该部队成立于 1938 年, 其本部隐蔽在北平城内, 先后在天津、塘沽、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包头、青岛、济南、太原、大同、运城、郑州、新乡、开封、徐州、碓山等 16 个城市设立了办事处、支部或分遣队, 并在野战师团配属了细菌战班, 与陆军病院配合行动。关于该部队的罪行, 文章根据史料提出: 一八五五部队“在北平和各地的细菌武器工厂中, 使用数千抗日军人和居民进行人体试验和活体解剖; 在华北战场上, 以极其隐蔽的方法大量使用细菌武器, 并与‘三光’作战相结合, 残忍之极, 仅 1943 年在鲁西北霍乱作战中, 就致使中国军民死亡 20 万人以上”。另外, 文章还叙述了该细菌部队在日本战败后销毁设施与资料的一些具体情况。透过这些研究可以得到充分证实的是, 第一八五五部队的战争罪

行并不逊于其他日本细菌部队,而细菌战的实施对于日军来说,是带有全局考虑的战略行为。

同样是关于一八五五细菌部队的研究,徐勇则主要利用来源日本的最新资料,如日本防卫厅图书馆所藏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课员井本雄男的《业务日志》(该档案为日本学者吉见义明首次发现,但据称该档并未完全开放,疑不开放部分为“人体解剖”和“细菌作战”等要害内容部分),以及当年为一八五五部队成员的日本军医(小川武满、堤美耶子、儿玉和子、犬丸良子等人)的口述史料,写成《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该文除利用上述日本史料印证了上述谢忠厚披露的史实外,主要是对已经发掘出的中日两国相关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这对于人们继续将该研究推向深入,无疑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关于强制劳工研究。以往的研究已经涉及劳工人数、劳工分布及受害情况等,而解学诗的《关于“特殊工人”的若干问题》(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则从伪满劳工中分离出由华北掳来的“特殊工人”作为研究对象,较深入地论证了这类劳工的来源、人数和不同于伪满其他强制劳工的特点。文章提出,伪满强制劳动主要有四种形态:“紧急就劳”(即强制摊派)、青少年劳动化、城市流动人口的“活用”、华北“特殊工人”的强制役使。而“特殊工人”在四种强制劳动中是最为残酷的一种。文章考察了“特殊工人”的被掳过程,证实日军曾大规模地进行过“抓劳工作战”,并建立了诸多战俘训练所和劳动训练营。关于此类劳工人数,文章依据日伪时期史料统计认为:“伪满后期四年间,关东军与重要厂矿奴役华北‘特殊工人’达20万人左右。”并说明“这个统计宁可说是偏低的”。关于受害状况,文章引据日伪资料说明此类劳工不同于他类劳工的“特殊”性,就在于他们是“丧失一切自由、随时都可遭

到杀戮的真正的战争奴隶”。应该说,这样的分类个案研究,对推动强制劳工研究的深入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以往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日军加害与南京市民受害,继而有人对国际救援进行研究,而现在又有人开始研究受害者的防患准备,张连红的《南京大屠杀之前南京市民的社会心理》(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4 期),即属此类研究。该文利用档案及其他史料,提出屠杀前南京尚有常住人口 54.7 万人(之前为百万),其中多为贫穷百姓,因无力迁移,战争来临时他们唯一的选择便是留在南京。国民政府也曾安排过一些保护滞留市民安全的措施,但最后关头却断掉了难民逃离南京的唯一通道。而对灾难的心理准备方面,该文提出:“政府和民众对日军攻击南京的策略意图认识不足”,“并没有考虑到日军占领南京后会进行屠城施暴”。另外,“政府将保护市民的重任毫不犹豫地托付给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许多市民也认为只要届时避入安全区,在西方人士的保护下就能避免日军的伤害”,也使灾难程度加深。此一研究,为人们考察南京大屠杀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

程兆奇的《南京大屠杀中的日军屠杀令研究》(载《历史研究》2002 年第 6 期),又是从加害者的角度研究南京大屠杀。屠杀俘虏缘起于日军基层部队自发行为还是日军高层命令?该文对此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考证。作者通过对中岛今朝吾、山田 二日记和第六十六联队战斗详报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日军在攻占南京的过程中屠杀的大量俘虏,不是所谓‘一部分官兵造成的突发、散发事件’,而是由现地日军自上而下的命令造成的”;“至少可以肯定,日军在师团一级确实下达过屠杀令”。该研究虽仅限定于屠杀俘虏而未包括屠杀平民,但联系到在屠杀中日军有意模糊战俘的界定,因而也从一个方面证明,日本灭绝中国人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该文对于揭露日本南京大屠杀“虚构派”的谬论,显有重

要意义。

关于“满洲移民”的研究。向中国移民,是日本侵华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因而它一直是学者研究对象。关伟、关捷的《日本“满洲移民”诸问题之探讨》(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主要利用了日本方面的史料,并参照已有研究成果,把该研究进一步深入。文章探讨了“满洲移民”之源起,政策制订实施过程及结果。引人注意的是,文章不仅分析了“满洲移民”对中国人民带来的严重危害,还分析了它对日本移民带来的灾难,披露了日本投降后日军对本国移民的残杀情况。

与日本侵华相关的战时沦陷区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除了殖民统治罪行研究外,对沦陷区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也逐渐深入。

在社会文化方面,沦陷区文学研究中出现了较大争论。张泉的《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谈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史实准确与政治正确问题》(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提出:“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判断和结论在政治上是否正确,取决于史料的确凿与否。”据此,文章认为“沦陷区似乎没有文学或只有汉奸文学的感觉”是以往研究“差错”的结果。“差错之一:‘笔部队’是中国沦陷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差错之二:‘皇民文学’是中国沦陷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认为,把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日本作家组成的“笔部队”作品划分到中国沦陷区文学,混淆了民族界限;“皇民文学”是台湾“皇民化运动”的伴生物,它认定“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台湾人是日本过渡公民”,而大陆沦陷区文学并不包括这些内容。另外,文章还提出沦陷区作家政治评判的依据问题,认为把张爱玲“塑造成‘文化汉奸’或‘附敌附伪的作家’,也形成了大量史实差错”。作者的上述观点,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对意见。而作为学术探讨,观点的交锋是正

常的也是必要的。

汪朝光的《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电影检查》(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1 期),主要利用档案史料,对战时沦陷区的电影检查制度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为了软化和奴化中国人,“作为新兴大众艺术并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电影,自然也成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国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章分别考察了汪伪政权、华北伪政权和伪满的电影检查制度,分析认为:“从汪伪政权表面上沿袭国民政府的电影检查制度,到华北伪政权另行自己的电影检查,再到东北伪政权基本上照搬日本电影检查制度”,“万变不离其宗,沦陷区电影检查的实质是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的,是为了禁止可能出现的反映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独立精神和民族感情的影片”。该研究的意义在于从一个具体的方面细化了日本文化侵略所包含的内容。

在沦陷区殖民统治方面,潘敏的《日伪时期江苏县镇‘维持会’研究》(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3 期),引人注意之处在于该文不是从道德审判的角度来研究一般被称为汉奸组织的维持会,而是对维持会产生的社会条件、参加者的不同类型、它的实际作用,特别是它与日本人的矛盾来进行分析。该文对江苏省 22 个县的维持会进行了考察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维持会中的上层人物基本上是地方头面人物,或者说是势力、有影响力之人,但他们进入维持会动机复杂”,“某些人是出于自保或安境保民而进入维持会;另外一些人是不得已而与日本人‘合作’”;“当然也有一些人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做事”。“正因为参与其中人动机复杂,才使维持会中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矛盾迭起。中国人显然的弱势地位迫使一些人只能采取退避的方式消极抵抗。一些地方的维持会几经易手,其资源汲取能力越来越强,而维持秩序的职能却越来越弱,甚至成为社会的乱源。”

对沦陷区其他方面的研究,农伟雄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西蒙的鸦片毒品入侵》、周德华的《沦陷时期日军对吴江县的粮食掠夺》(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3 期),作者都利用了独自掌握的史料,从不同方面论述了日本殖民统治罪恶,作为个案研究而具有学术参考价值。

(二) 中国抗日研究

1. 政治研究

谢忠厚等人合著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型——彭真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与实践》(人民出版社 8 月版),是把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前后连续的特殊时期,而具体地考察它对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作用,即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例,具体地论述了共产党人如何推动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向现代化进步的实践及其结果。作者特别强调,“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奋斗的结果则是,中国社会形态中出现了过渡到现代化而必经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针对西方一些学者关于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利用了农民的民族主义”,新中国成立“是农民自发性向政权结构提出挑战的顶点”等观点,提出:“抗日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密切联系着”,而通过这一时期中共对社会改造的努力,极大地削弱和摧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基础,这是与打败侵略者同样重要的胜利,它标志着抗日战争成为新旧中国历史接续的枢纽,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由此得以完成。温锐、戴利朝的《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以战后“联合政府”的夺取为例》(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1 期),也是以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来作为研究对象。文章认为:抗日战争使中国社会政治全面刷新,中共力量的空前壮大和客观上形成的“一国两制”政制及发展起来的中间党派力量,为中国成立以民主政治为

基础的“联合政府”创造了条件。但由于战后国际环境的改变和国民党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使中国在战时形成的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中断。文章总结认为:导致国民党的历史性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而与之对应,中共在两党破裂后很快战胜了对手,也充分显示了抗日战争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以上两种研究,为人们从另外的角度来审视抗日战争对中国产生的历史影响,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除以上宏观研究外,还有对与抗战时期政局相关的其他具体问题的研究值得注意。其中,杨奎松的《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4 期),引用了大量台湾现存史料,从国民党方面探讨了引发皖南事变的原因和过程。文章认为,抗战开始两年后“两党关系就不期然地走向了紧张”,而“皖南事变的爆发,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从国民党方面来看,“以正统自居盲目自大和坚持一党独裁的心态,难以适应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和必欲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的政策,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但是,“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党想要重新拾起军事‘剿共’的办法来防止共产党的壮大,也并非易事。因此,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又不能不带有相当的偶然性”。该研究的主要价值在于,由于史料占有方面的优势,使它比以往更加详实地描述出导致皖南事变发生的具体历史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的种种政治考虑及与此相关的政策变化。陈红民的《“抗日反蒋”与“联蒋制日”——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1932—1936)》(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3 期),主要引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存资料,探讨了胡汉民与两广派在宁粤分立时期的政治主张。文章认为,胡与两广的主张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宣传‘抗日反蒋’的主张,也有支持抗日的举动;另一方面则幻想‘联日制蒋’,

并有与日方接触的行为。”何以如此,文章认为:这“与南京方面的巨大压力有关……‘抗日’抑或‘联日’均是反对南京与蒋介石的手段而已。”该研究的价值与在于利用新发掘的史料,不仅揭示了史实,也说明了历史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即如作者所说:“政治人物所公开标榜的口号与实际运作之间的距离。”作者另外文章《胡汉民与张学良关系述论:1931—1936》(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也是利用了上述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资料,探讨了国民党内反蒋派联络的某些特征。除文章本身对历史的描述确有参考意义之外,也由此说明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资料确实有很大的研究利用价值,值得学者重视。

2. 军事研究

郭汝瑰、黄玉章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是迄今为止关于抗日正面战场研究最为系统的一部专著。该书的特点首先是利用史料的广泛。作者参考中国两岸以及日本、美国的档案文献报刊图书及作战日记等,仅图书一项即达300余种,文中引用了290多部。其次,该书研究对象包括了正面战场所有重大战役,对军事战略等全局性军事问题也有深入论述,其中尤以各战役利弊得失的分析而见长,不乏独到见解。第三,该书对两个战场的关系也进行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分析,主要强调了两者的配合作用。该书的学术价值,在于它对历史的描述因掌握了大量资料而相对比较准确。

3. 外交研究

除战时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与外交活动研究外,开始有学者从宏观方面进行外交制度的研究。陈雁的《蒋介石与战时外交制度》(载《民国档案》2002年第1期),即属此种研究。文章是以对蒋介石参与外交活动过程的分析入手,探讨了国民政府外交机构的调整、人事冲突及其对外交活动的影响,进而说明战时国民政府

外交制度的变化。文章结论认为:战时外交显示了“主动性”与“灵活性”的特点,“而蒋介石的‘人身外交’无疑是中国战时外交‘主动性’与‘灵活性’最集中的体现”。但“人身外交”被滥用到几至“事必躬亲”的地步,“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元首外交’理应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另外,文章还认为:“战时出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一代‘外交家’与战时特有的外交制度并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受战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整个中国外交制度嬗变演进的必然结果。”该文为人们认识战时中国外交得失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刘贵福的《九一八事变后特种外交委员会的对日外交谋划》(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2 期),则具体地研究了国民党外交决策研议机构“特种外交委员会”。文章详实记述了该机构从 1931 年 9 月 30 日成立至 1932 年 1 月 2 日撤消之间的全部活动情况,认为该机构存在时间虽短,但确起到了主导中国外交的作用。文章评价该机构:“以国联为舞台,以欧美国家为工作对象,坚持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立场,殚精竭虑,群策群力,为制止日本侵略,促使日本撤兵,作了大量外交谋划,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同情与支持,也使日本在国际上日益孤立。但因缺乏实力为运用外交手段的基础,外委会的种种努力最终落空。”该研究的特点在于它考察了以往较少引起注意的一个国民党外交研议机构,从而为人们研究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外交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提供了具体素材。

李嘉谷的《“苏日中立条约”签订的国际背景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载《世界历史》2002 年第 4 期),除阐述了《苏日中立条约》所附“宣言”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而理应遭到中国抗议的观点外,关于国民政府的态度提出了引人注意的见解,即认为国民政府对该条约的评论是十分慎重的,蒋介石甚至认为:“是以苏日条约,就整个局势而论,对于我国抗战,与其谓有害,无宁谓其有益矣!”

这是因为,就日本来说,签订该约主要是针对美英的。故作者认为,“《苏日中立条约》促使美英在远东采取强硬政策,并积极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这种观点是从与以往不同的角度来评价《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的影响,值得人们思考。

4. 社会经济研究

何友良的《蒋经国“建设新赣南”思想简论》(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以蒋经国在赣南的“新政”主张与实践为研究对象,对影响一时的赣南“新政”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文章提出,以“五有”(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为目标的赣南社会改革,在战时国统区十分罕见。而蒋经国的“新政”思想渊源,事实上并非完全“落在苏联的模式里”,其中还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古代政治家的经验、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当然也包括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从实践来看,这种社会改革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他的改革目标与战时环境、社会条件尤其是国民党的体制和统治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最终是难以实现的,只能是“一项新奇动人”的“政治实验”。该研究不仅对于人们认识蒋经国的个人思想行为有参考价值,也使人们对战时国统区的一些社会改革多了一些了解。

李伟中的《南京国民政府保甲制新探》(载成都《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4期),也探讨了战时国统区的乡村社会制度的变革。文章把南京政府的保甲制分为“剿共”保甲制和“新县制”保甲制两种体系,认为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第一,推行目的不同。前者针对共产党自不待言,而后者“主要是为持久抗战提供一套比以往自治体制更实用的基层行政体制”,它的实行使国民政府“集聚战争资源的行政效率有了较大的提高”。第二,内容不同。与目的的不同相关,两者的行政归属、保甲长的产生、管教养卫的侧重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第三,性质不同。前者继承了传统保甲

“由身而家而族”的封建宗法制特征,同时带有军事体制的色彩;后者则是“自治与保甲相通融的新体制”,即“纳保甲于自治”。以上分析,有助于人们了解战时国统区乡村社会制度的基本情况。

另外,吴景平、王晶的《“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载《近代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考察了上海银行公会当时对南京政府的态度及其对时局的种种影响;田霞的《抗日战争时期陕西工业探析》(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3 期),考察了战时陕西工业发展状况;高冬梅的《抗日根据地救灾工作述论》(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3 期),考察了作为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救灾工作在敌后根据地的实施及其成效。这些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体现了研究的深入。而吕文浩的《日本空袭威胁下的西南联大日常生活》(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4 期),则是以社会学的角度,并运用社会心理研究方法,对西南联大师生由日机空袭而来的特殊生活内容以及人们的心态进行了考察。从研究方法来说,这是一种尝试。

(三) 战争遗留问题研究

1. 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研究

由张海鹏、步平主编的《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月出版),是继王智新的《揭开日本教科书问题的黑幕》和苏智良《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之后,又一部评析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学术专著。该书上册对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出现、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系统评介,比较深入地分析了该问题产生的日本国内与国际的政治背景,以及它反过来对日本社会和周边国家产生的影响;下篇是针对日本扶桑社教科书错误史观和对历史歪曲的具体问题进行剖析。另外,该书还附录了自 1945 年至 2001 年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大事年表。该书的价值在于它比较清晰地描述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历史脉络,并比较全面地

揭穿了右翼教科书的要害。该书在中日两国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2002 年 4 月,继“编纂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初中版《新历史教科书》之后,日本文部科学省又审议通过了由“日本会议”编写、明成社出版的高中版《最新日本史》。郭素美、王希亮的《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2 期),指出该右翼教科书的要害在于:“全文刊载了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对日本近代以来发动的侵略战争,通篇不提‘侵略’二字”;“把战争责任推给对方”;“美化殖民统治、掩盖战争犯罪”;“否认东京审判”;“鼓吹修改宪法,煽动收回‘固有领土’”等等。文章还分析了“日本会议”和“编纂会”一脉相承的关系,认为右翼教科书相继出台,表明日本的右倾化正在一步步加剧。同样是针对《最新日本史》,王智新的《“日本会议”与〈最新日本史〉》,则对编纂该教科书的“日本会议”进行了剖析,指出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改名的“日本会议”,从它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反对“东京审判史观”和“谢罪外交”,并提出要向日本青少年“强化启蒙运动”。文章认为该教科书的特点一是宣扬皇国史观,二是美化侵华战争和殖民统治,它严重地妨碍了日本青少年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以上两文均成文于明成版教科书出版后不久,这表明了中国学者对日本教科书问题的高度敏感和极端关注。

2. 关于日本右翼研究

林晓光的《日本右翼思潮与右翼团体史考》(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1 期),比较系统地考察了近代以来日本右翼思潮与右翼团体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状况。文章认为,最早提出右翼政治理念的是平冈浩太郎、头山满和内田良平等人;最早的右翼团体是“玄洋社”,其后的“黑龙会”、“犹存社”、“民间社”等,虽名目不同、口号各异,但思想渊源无不出于“玄洋社”。日本右翼思潮和右翼团体迅速发展是在 20 世纪初,在思想上,出版了,“鼓吹用皇国至

上、忠君尚武、种族优秀的等思想理论改造日本”的多种著作；在组织上，日本各地以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为宗旨的在乡军人会统一组成“帝国在乡军人会”。到了 30 年代，右翼团体以暴力手段支持军部法西斯势力，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全面法西斯化。而到战时，“大政翼赞会”的成立，又使右翼组织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体制的一个子系统。文章还分析了战后日本右翼得以生活动以及 70 年代后出现的“新右翼”与“传统右翼”的异同，提出右翼的共同特征是：鼓吹皇国史观、强调皇权至上、宣扬种族优秀论、反对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运动等等。该文对人们了解日本右翼的历史与现状，有重要参考价值。

3. 关于战争赔偿研究

袁成毅的《日本对亚洲国家战争赔偿立场之比较——以国家间的赔偿为中心》（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3 期），对战后日本对亚洲各受害国战争赔偿情况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对不同国家赔偿有不同立场，其中对中国的立场是设法逃脱赔偿的责任，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立场则是虽无赎罪意识，但能承认有赔偿责任。日本采取的不同立场，与各受害国的对日政策有关，同时也与战后冷战局势的形成和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市场的需求有关，此外它也是日本错误的战争史观的一种表现：第一，不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甚至在 1972 年《中日联合声明》中也没有提到“侵略战争”；第二，只承认日本败于美国而不承认败于中国。该文有益于人们了解战后日本赔偿情况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4. 关于钓鱼列岛主权归属问题研究

鞠德源的《评析 30 年前日本政府〈关于尖阁列岛所有权问题的基本见解〉》（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4 期），对长期以来未曾受到重视的一份日本外交文件进行了剖析。文章指出，这份 1972 年由日本外务省向全世界发表的《关于尖阁诸岛所有权问题

的基本见解》，是日本企图在战后重新窃取中国领土钓鱼列岛的重要纲领，它不仅严重歪曲历史，把钓鱼列岛说成自 1885 年即为日本“南西诸岛”的一部分，而且否认该列岛为《旧金山和约》规定日本应放弃霸占的领土之列，而将其列入美国托管地而于 1971 年日美签订冲绳归还协定后应由日本收回领土之列。该文还例举大量史证说明钓鱼列岛为中国领土，但文章的价值并不在此，而在于它通过对一份鲜为人知的史料的分析，勾勒出日本窃踞钓鱼列岛的历史轨迹与战后日本的“舆图窃土战略”。

米庆余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考——从明代陈侃〈使琉球录〉谈起》（载《历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是通过对 1534 年中国明代册封使陈侃上呈的《使琉球录》的研究，来论证钓鱼列岛的主权归属。文章认为：该史料对当时的中琉疆界有明确记载，“后世中、日、琉三国的政府官员、学者乃至岛民水夫亦皆以为是。这充分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原本便是中国领土，历史记载的古米山（现今的久米岛）才是古代琉球王国的西部疆土。”文章还分析了后世对陈侃记载的确认，引人注意的是其中引用了 1970 年在日本出版的由曾任日本外务省官员的鹿岛守之助撰写的《日本外交史》第 4 章“琉球诸岛归属问题”，内中所列琉球诸岛图并无所谓的“尖阁列岛”，从而有力论证了钓鱼列岛为中国固有领土。

5. 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研究

李媛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以战后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台湾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比较详尽地论述了自“日台和约”签订到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过程。文章指出，中国政府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即首先通过民间组织向日本提出了“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制造‘两个中国’；不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三原则。1972 年中国政府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

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和约’必须废除”的中日复交三原则。文章还分析中国政府的策略灵活性与在复交过程中有效排除“台湾问题未定论”,以及日本朝野关于中日复交三原则的分歧和斗争过程,充分肯定了田中内阁在其中的作用。该文的价值在于它把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一个要害问题及其解决的过程比较详细地展现出来。而值得继续深思的问题是,何以至今为止,台湾问题仍然不断地困扰着中日关系。

二 中国台湾的相关研究

2002年,所见发表的有关中日关系史的论文,不仅多集中于日本占领台湾时期,而且深入到日本殖民统治的各个层面。

吕绍理在《台湾史研究》第9卷第2期发表的《展示台湾:一九〇三年大阪内国劝业博览会台湾馆之研究》一文,通过对日本举办此次博览会并设立台湾馆的系统考察,着重说明日本殖民者的政治用心和目的。指出:在大阪举办博览会之际,“日本仍然笼罩在甲午战争与义和团事变胜利的气氛之中,这两场战役让日本人相信,自己已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因此如何展现这个亚洲帝国的荣光,是大阪博览会与前四次劝业博展示设计截然不同的思考点,夸耀富庶与强盛于是成了这场博览会的特色之一”。“一九〇三年在大阪天王寺所举办的第五回劝业博览会,不但脱离原来单纯鼓励日本人民‘值产兴业’的目标,更包含了展现日本帝国国力的意味。台湾正好是第五回内国劝业博览会中展示帝国光荣最重要的媒介”。进一步分析指出:“特产买卖只是吸引观众的手段,而非建设台湾馆的主要目的。做为第一次将第一个殖民地放入‘内国劝业’博览会来展示,台湾馆的政治展示目的绝对强过其他较偏向产业经济的主题馆。”除了将台湾馆置于参观路线的终点,整个展示宣

扬“日本在统治台湾八年之后的建设成果”外,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天皇、皇后和太子亲临展馆参观,以及总督府将台湾岛的地理模型献给太子。“皇帝、皇后和太子的巡视、献纳地理模型,一方面确认了这个可观看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则在仪式上象征性地将殖民地整合进入帝国的体系”。

该文同时认为,日本举办博览会虽以“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相标榜,但出于维护其殖民统治的需要,却并不愿意让台湾人享受太多的“文明开化”成果。分析指出:日本在 1862 年之后即认识到博览会对于“殖产兴业”与“文明开化”的作用,1903 年的大阪博览会是日本统治台湾之后,第一次得以将这块殖民地的状况“展示”给日本以及国际的机会。殖民政府也希望能借着参观博览会与游历日本国境的经验,使台湾人兴起“上国荣光”的感触,强化台人对殖民统治的认同。从台人参观返乡后发表的种种言论中,似乎也看到博览会的确达到了这些效果,即在强烈的刺激下兴起急起直追的希望。“然而,就在台人热切期待急起直追的同时,殖民政府不论在产业或教育的政策上却设置了许多关卡,不愿意台人进一步取得更多现代化的资源。”

孟祥瀚的《日据初期东台湾的部落改造:以成广澳阿美族为例》(《兴大历史学报》第 13 期),以东海岸成广澳地区的阿美族为对象,详细论述了日本占领台湾后如何逐步确立管理体系,并在此体系的建构中,传统阿美族内部的社会管理机制如何被代表“国家势力”的行政体系与警察体系所取代。指出:日本占领台湾后,最初采取清代抚垦局的制度,以怀柔的态度化解当地阿美族对于政权更迭的疑虑。但是“随着日人着眼台湾山地森林资源的开发与意图更加强势控制台湾原居民时,此一怀柔的政策也随着改变”。日本对阿美族管理体系的逐步确立,正是在此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郑政诚的《日治时期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的原住民调查(1909—1922)》(《台湾文献》第 53 卷第 4 期),对日本占领台湾后在所设“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第一部法制部下专设“蕃族科”对高山原住民进行调查,以及“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撤消后又设立“蕃族调查会”继续未竟之调查与编纂,作了系统论述。

蔡承豪的《日治初期台湾蓝靛业的相关调查》(《台湾文献》第 53 卷第 4 期),从台湾产业史研究的角度,着重对日本占领台湾初期进行蓝靛业调查获取的资料进行分析。指出,同其他产业一样,日本占领者调查蓝靛业的目的完全是“基于‘殖产兴利、节省开支’的考量”,亦即“明了将来可发展的契机”。因此,从调查来看,“日人的调查,范围之广,内容之深入,其所得成果之丰硕,在当时可谓甚为难得,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是批相当值得研究者妥善运用的宝藏。而透过这样的调查,日人对于台湾的蓝靛业渐能掌握,其后也可见日人在台投资经营和总督府介入经营的踪迹”。

吕绍理的《日治时期台湾广播工业与收音机市场的形成(1928—1945)》(《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 19 期),通过对日本占领台湾后广播事业发展与收音机市场形成的考察,指出:台湾广播事业一开始即表现出由殖民统治者独占的结构特性,“而此一特性亦表现在广播节目的制作必须成为殖民政府同化政策的宣传工具,因而无法摆脱政治力的干预”。收音机市场的形成,包括收音机的制造与传销,同样呈现“由殖民政府高度垄断的特征”。

但研究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的历史,并不完全着眼于揭露和谴。对那些在日本统治时期对台湾作过贡献的日本人士,也有人研究。陈青松发表在《台湾文献》第 53 卷第 2 期上的《日治时期的文史瑰宝石坂庄作》一文,即是为纪念日人石坂庄作而作。石坂 1896 年以随军记者身份到台湾,初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后经商致富,遂定居基隆,直到逝世。该文从设立“石坂夜学校”(后改称“基隆

夜学校”)、创办“石坂文库”图书馆和热心台湾古迹碑记收集与整理,详细介绍了石坂对台湾的“三大贡献”。最后强调:当时“有不少日籍财团,纷纷竞挖台湾的资源归其母国,少有像他努力回馈给台湾的子民。再加上他本身以汉学儒道自居,实践中国儒家思想的‘仁爱’精神;特别是他的热爱人生、钻研学问,一生丰盛的著作,遗爱世间,为有识者誉为‘人格者’,确实是日人中的异数”。对石坂给以相当高的评价。

陈翠莲发表在《台湾史研究》第9卷第2期上的《去殖民与再殖民的对抗:以一九四六年‘台人奴化’论战为焦点》,是一篇长文,内容与台湾受日本殖民统治历史紧密相关。作者把1946年台湾当局指责台湾人受日本统治“奴化”与以台湾知识分子为主进行的反驳,确定是一场“论战”,并作了详尽论述。认为:“战后陈仪当局的统治带有严重的政治歧视”,指控受日本殖民统治50年的台湾人民已经“奴化”,非得经过“中国化”而不能享有同等对待,“其‘中国化’政策的思维方式与旧殖民者无异,对台湾人而言,祖国的‘光复’只不过是同族的‘再殖民’”。同时,“奴化”的指控“对台湾人尊严伤害至深,受挫的台湾精英企图自我防卫,乃从过去被殖民经验中寻找‘我者’与‘他者’的区别,亦即‘日本统治近代化论’其实可以说是‘台人奴化论’的反论”。作者在文中还强调应把这次“论战”作为“二二八事件”的政治背景来考察,实际说明“二二八事件”与“论战”有着直接关系。

台湾学者关注的另一热点,是关于抗战史研究。

刘维开的《蒋中正的东北经验与九一八事变的应变作为——兼论所谓‘铣电’及‘蒋张会面说’》(《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9期),从蒋介石早年曾被孙中山派往东北进行革命联络及其对东北问题的认识入手,论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的应变态度。认为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实行“不抵抗”责任在张学良,“张氏是主要的

决定者”；对于日本军事侵略，“从蒋中正在其所掌控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的布置，以及对于日本要进攻上海，或者战事扩及关内时的计划，实可以了解蒋中正所采取的态度绝非‘不抵抗’”。并对直接有关“不抵抗政策”的两个问题，即“铣电”和“蒋张会面说”的真实性加以考证。指出：洪钊回忆称蒋介石于 1931 年 8 月 16 日致电张学良（即“铣电”），电中令张“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但除了洪的回忆外，“包括其他相关人士的回忆、档案馆度藏的档案及蒋中正个人资料等，几乎没有其他资料证实此电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铣电’是否能作为蒋中正主张‘不抵抗政策’的重要史料，显然是需要仔细考虑的”。“蒋张会面说”为何柱国的回忆，称蒋、张于 1931 年 9 月 11 日在石家庄秘密会面，谈话后张对何说蒋要他“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但查考有关档案史料，追踪蒋、张当时的活动，他们“几乎不可能有时间见面”。因此，在讨论“不抵抗政策”时亦“不宜一再被引用，以免误导研究方向”。该文是作者应邀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在北京主办的“九一八事变 7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在会上报告时即有学者表示不同意见，展开讨论。看来，这一一直为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还将继续讨论下去。

事实上，黄自进发表在《近代中国》第 152 期上的《蒋中正先生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责任的探讨》一文，同样讨论蒋介石对“不抵抗主义”的责任，看法则与刘维开不尽相同。该文通过“事变前夕的中日情势”、“‘不抵抗’政策的由来”、“‘四不’（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政策的实践”等部分的分析，认为：“不抵抗政策，是针对九一八事变前夕中日两国层出不穷的冲突案例，国民政府与东北当局共识下所决定的应对准则”。但“面对挑衅，不积极回应，并不表示不能自卫”。基于此种认识，提出：“东北原非国民

政府直接管辖地,因而东北的不抵抗,不能归罪于国民政府,蒋自然也不需负责。不过,东北事务不能防患于未然,蒋至少有未尽督促的责任。”且“不能明察敌情在先,继而忽视外侮在后,反而汤山幽禁胡汉民,促使广东愤而独立。‘兄弟阋墙,外御其侮’,蒋不能讳过”。

关于汪伪政权研究,有两篇论文。一是林美莉的《日汪政权的米粮统制与粮政机关的变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季刊》第37期),对传统观点表示了不同看法。该文开宗明义提出:“汪政权是不是真的能够为沦陷区人民争取权益,保存元气?从战时日本与汪政权所推展的经济事务进行前后时期的比较研究,或许是一个可以尝试的范畴。”通过对汪伪政权与日方进行交涉,陆续设立“粮食管理委员会”、“粮食部”、“米粮统制委员会”等粮政机构变迁的研究,认为“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汪政权十分看重主权与治权的自主性,故在特定的条件下,为沦陷区百姓争取到比日军直接统制更好的待遇”。或表述说:“汪政权适时运用了日军无法在华彻底统制的困境,向日方提出收回日军控制米产区的协商,并且以政权力量配合米商收购米粮,实现其调节民食的诉求。”对汪伪政权研究,近些年发表了一些不同观点,该文提出的看法自然会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另一篇是邵铭煌的《汪精卫政权与日本的一场政治秀——交接租界、撤消治外法权与废约》(《近代中国》第152期),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与汪精卫伪政权进行的所谓“废约”作了考察。邵是台湾学界公认的研究汪伪政权方面的专家,著述甚多。在该文中,作者把对日、汪举动的考察置于当时国民政府与美英等国“废约交涉”的大背景下,指出:“‘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乃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的产物,也是政治策略运用之结果”,汪伪政权“完全处于被动立场”。因此,“日本侵华的现状丝毫未改变,汪政权仍在日本控制之下。

因而对汪政权言,收回租界及废止治外法权之举,都只是收到虚张声势、粉饰颜面的效果”。至于随后双方签订的“基本关系条约”,“不啻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不平等条约”。最后归结说:“日本交还租界与撤消治外法权,汪政府大张旗鼓的交涉接收云云,套一句台湾话‘输人不输阵’,其实是表演给反侵略同盟国家看的一场政治秀而已。”

卞凤奎的《台湾义勇队在华南地区的抗日活动》(《台湾文献》第 53 卷第 4 期)一文,则根据中、日文资料,对抗战时期“台湾义勇队”的成立背景、经过、人员构成、活动以及抗战胜利后撤回台湾被当局解散、队长刘友邦遭杀害的过程与结局作了详尽介绍,认为“台湾义勇队”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下的产物”,抗战时期在医务、后方生产和开展对敌政治工作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抗日战争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指出,抗战期间它所以未能实现成为武装军队的愿望,一方面为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压制,另一方面与美国当时对台湾的政策密切相关。资料丰富,观点鲜明,构成了该文的显著特点。文章结尾,作者感叹写道:“台湾义勇队”“昔日为国家牺牲奉献,出生入死报效国家之壮举,不仅为国人所遗忘,更为政府所忽视。相较之下,海峡对岸之中共方面,对台湾义勇队的推崇和肯定之积极作法,虽然其用意不排除其中‘统战’之目的,但实在值得我们深思。”表述虽不免含有政治意味,但希望尊重历史的态度是真诚、坦然的,也是可贵的。

三 海外的相关研究

(一) 英语国家的研究

傅佛果编的《睿智的僧侣和嗜血的武士:明清时期中国人的日

本观》^①是一本论文集,主要篇目有:“明代中国人之日本观的演变”;“中国人对日语的理解”;“清初的日本观及对日政策”;“明清时期旅居过长崎的中国人的日本观”;“清朝人对儒家学说从日本回传中国的反应”;“晚清中国学人在日本:他们的生活和交往”;“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日本观”等。20 世纪之前,中国文化以书籍、艺术品和宗教教义等多种形式涌入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学术界关注较多的是日本和日本精英人物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反应,而很少注意中国人是如何看日本人的。本书收集各家之论,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S. C. M. 潘恩的《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认知、实力和首要地位》^②一书,对长期为西方学术界所忽视的甲午战争进行了考察和评述。作者认为,这场战争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改变了亚洲乃至世界原有的格局。日本在战场上迅速打败中国,使得欧洲人不得不重新审视日本,不仅把日本当作亚洲的强国,而且把日本视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日本还一跃而成为超级大国英国的一个远东盟国。与此相反,中国的失败则加重了西方人对中国已有的轻视心理,进一步有恃无恐地侵犯中国的主权。作者指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自身的强大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的虚弱。加上后来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人盲目自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错误地认为美国也不堪一击。作者认为,甲午战争的影响至今余波未息,中国目前正在为改变亚洲的格局、恢复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而努力。作者

① Joshua A. Fogel (ed), *Sagacious Monks and Bloodthirsty Warriors: Chinese Views of Japan in the Ming-Qing Period* (Eastbridge, 2002).

② S. C. M. Paine,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Perception, Power and Prim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在结论部分中深入分析了日本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和原因,并对中国未能尽早实现现代化的深层次原因作了考察。

布鲁斯·A·艾尔曼的专著《威尔逊与中国:山东问题新探》^①利用中日美三方的档案材料和文献资料,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看法。其中,一个看法是,中国和西方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威尔逊在和会上背叛了中国,本书作者则认为,威尔逊不但没有背叛中国,相反,他成功地与日本达成协议,确保中国在山东的主权得到尊重。但是,中国谈判代表拒绝签署巴黎和约,为苏联进入中国并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创造了条件和机会。

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越来越重视,近年来相关学术论著层出不穷。李飞飞(音)等人合编的《南京 1937: 痛苦的记忆与创伤的医治》^②一书,是集中日美等国学者探讨与反思南京大屠杀的综合性著作。全书共分 4 个部分:一是“全球语境中的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象征意义做了探讨,并对大屠杀进行了评估。二是“重访南京:中国和日本的观点”,对大屠杀的原因进行考述,并介绍了中国和日本关于南京死难者人数的争论。三是“记住南京大屠杀”,介绍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些新的回忆材料,并警示人们要记住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四是“医治创伤”,对东京审判、战争责任和战后的责任等问题进行考察,并指出,南京大屠杀是超越国界的一次历史事件,人类应认真总结其中的教训,为创造更加和平与和谐的国际社会而积极努力。

① Bruce A. Elleman, *Wilson and China: A Revised History of the Shandong Ques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2002).

② Feifei Li, Robert Sabella and David Liu (ed.), *Nanking 1937: Memory and Healing* (New York: M. E. Sharpe, 2002).

Yuki Tanaka 和苏珊·布朗米勒的《日本的慰安妇: 战争和占领期间非自愿的军妓》^①是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最新力作。作者广泛搜集第一手资料, 描述了战争期间被强迫充当慰安妇的妇女们的悲惨遭遇。本书首次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 美军占领日本后, 对慰安妇并未给予任何帮助, 而是把慰安妇控制起来, 充当美军的性工具, 以防止美军强奸日本妇女, 并防止性病的传播。

拉塞尔爵士的《武士道与武士: 日本战争罪简史》^②简述了 1931—1945 年间日本军队在亚洲各国肆意侵略、杀戮平民、劫掠城市乡村、屠杀俘虏、残酷虐待战俘和平民的种种暴行。本书客观地描述了一些个案, 并详细考察了日本无视人类共有的道德准则的深层原因。作者特别指出, 日军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显得尤为残暴, 1937 年的南京大屠杀则是日本侵华系列暴行中最惨绝人寰的一幕。日军对战俘的虐待也是骇人听闻的: 打骂、羞辱、饿饭、体罚、强迫他们像奴隶一样做工等, 种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成千上万的战俘被折磨致死, 幸存者则终生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中。

安德烈·马丁·富尔达发表《重评台湾的民主运动: 对日本和国民党统治下的反对派组织的比较分析》^③一文, 对台湾反对派组织在两个典型时期的民主活动进行比较分析, 从中寻找台湾民主运动发展的连续性。作者选取了两个典型时期: 一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 1914 至 1937 年, 一为国民党统治下的 1977 至 1986 年。这

① Yuki Tanaka and Susan Brownmiller, *Japan's Comfort Women: The Military and Involuntary Prostitution during War and Occup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② Lord Russell of Liverpool, *The Knights of Bushido: A Short History of Japanese War Crimes* (London: Greenhill Books, 2002).

③ Andreas Martin Fulda, "Reevaluating the Taiwanese Democracy Movem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Opposition Organizations under Japanese and KMT Rule",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 34, No. 3 (Sep. 2002), pp. 357—394.

两个时期在诸多方面有惊人的相似性:二者尽管都采取高压统治,但都支持经济和教育领域的现代化政策,都希望把台湾变成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日本人把台湾当作进行扩张活动的跳板,国民党则把台湾视为反攻大陆的基地,二者对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都没有真正的兴趣;二者的现代化政策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但是现代化政策在客观上又激发了部分台湾精英人士对民主的追求。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主义,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则是一种政治殖民主义,台湾人对民主的追求始自日本统治时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并最终在蒋经国时代结出果实。通过比较分析,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1)在这两个时期,台湾的政治反对派都产生于政治统治框架的内部而非外部,温和的反对派组织在此类环境中最适宜生存和发展;(2)国内的反对派组织对台湾政治和社会的影响远远大于流亡海外的反对派组织;(3)和平的方式比暴力革命更适宜。作者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讲,长期被忽视的两位温和的政治活动家林献堂(日据时期)和康宁祥(国民党时期)对台湾民主进程所起的推动作用比蒋渭水和蒋经国更为重要。

(二) 日本的研究

2002 年以“中日关系”为题的著述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菅野正的《清末日中关系史的研究》(汲古书院出版),是作者有关清末中日关系史论文的结集,时期限定在辛亥革命前后。作者依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和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收藏的有关未刊资料,对近代华南社会和日本、义和团运动和日本、民国初期的对日民族运动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由于《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加强了对华南特别是对福建的影响和控制,福建成为其势力范围,所以该书对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福建的争夺控制活动,对

在辛亥革命前出现的有组织的排斥日货以及革命派和华侨在其中的作用进行了较全面探讨。作者还根据新发现资料,对《辛丑条约》签订时日本对荣禄施加影响、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的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田中明主编的《近代日中关系再考》(日本经济评论社出版),是日本研究者和中国学者解学诗合作的论文集,主要围绕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特别是伪满洲国期间的侵略及其支配机构、国家权力发动的主要形态及战争犯罪、强制劳工、细菌战、日本帝国主义东北支配史、伪满洲国日系企业、满铁调查部、中日两国对七三一部队的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史、日本天皇制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解学诗并对伪满洲国经济研究课题及资料情况进行了介绍。

口秀实的《从日本海军看中日关系史研究》(芙蓉书房出版),是作者多年研究的成果。长期以来,研究者大多对日本陆军和外务省在中日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比较注意,而忽视了日本海军的作用。作者认为,仅仅分析日本陆军和外务省在对华政策中的作用是不够的,它难以说明为什么中日战争会发展到日美(太平洋)战争及其关联。该书通过对日俄战争结束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海军在对华决策中作用的具体分析,提出海军的对华政策与对美政策有很大关系。海军和陆军不同,在对华政策中它考虑更多的是与其假想敌美国战略有多大关系,如果没有或关系不大,一般是不大关心的。在对华地域方面,也有所不同。陆军比较关心东北和华北,海军则比较关心华中和华南地域。所以,如果说陆军是“大陆政策论者”,而海军则是“海洋政策论者”。当然,为了共同的目标,陆海军在对华政策方面的相互协调也不容忽视。海军有和陆军对立的一面,而对中国东北利权的保护又是一致的。海军有和外务省共同抵抗陆军的一面,同时又有与陆军联合对抗外务

省的一面。日本的对华政策就是在这种三者的复杂关系中产生的。

除了以上直接讨论中日关系的著述外,成果多集中在以下研究领域。

1. 清末中国留日学生运动研究。大里浩秋、孙安石主编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的现阶段》(御茶之水书房)是一本论文集,共收入 9 篇论文和两篇目录,主要内容是从动机、活动和思想三个方面对留日学生教育的先驱嘉纳治五郎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参与、速成教育的利弊、留学生监督处的设立、小说《留东外史》、从清末到 30 年代的留学经费、日本政府对留学生的生活调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留日状况、伪满洲国留学生状况和日本“对华文化事业”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研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书中大里浩秋对 1907 年开始的 4 年间清政府留学日本学生监督处编辑发行的《官报》杂志进行了详细介绍。《官报》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研究清末留日学生的珍贵资料,到宣统三年(1911 年)正月发行了 50 期,基本上是一月一期,分奏章、文牒、调查报告、经费报销、学界记事等栏目,对各学校的留学生入学转学退学人数、成绩、生病住院、事故、经费报销、官费支出、监督处的收支等都有详细的记载。但一直没有受到研究者特别是国内研究者的注意。日本著名中国留学生研究专家、早稻田大学教授实藤惠秀曾倾全力加以搜集,并将原本归还中国(但下落不明),缩微胶卷收藏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该书附有《官报》目录和明治时期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的中国留学生相关资料目录,对于研究者很有参考价值。

2. 抗战期间日本在华鸦片走私与经济掠夺研究。山田豪一的《满洲国的鸦片专卖》(汲古书院),利用大量档案资料,通过对伪满洲国为了获得财政收入而大肆进行鸦片专卖策划、实施过程的研究,清晰地描述分析了日本在伪满洲国实行鸦片专卖的来龙去

脉、蒋介石的对应、东北南部和河北北部的鸦片种植。但该书仅写到 1938 年,此后部分尚望作者继续努力。

本庄比佐子、内山雅生、久保亨合编的《兴亚院和战时中国调查》(岩波书店),是关于兴亚院和战时中国调查的研究合集。关于兴亚院,如作者在书中所介绍,是有关中国调查机关中比较特殊的一个机构,总理大臣兼任总裁,副总裁由陆、海、外、藏相兼任,具有中央省厅一样的权限,和民间的各种调查机构和政府的外围团体如东亚研究所完全不同,完全是为了推进中日战争的机构。同时与在中国东北地区经营铁道和经济开发为主要任务的国策公司“满铁”也不一样,和中日战争的关系更深。兴亚院于 1938 年正式成立,作为和占领区有关的行政机构,主要任务是在确保军队强力介入权限的同时,对于各省厅所管业务进行调整,虽然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对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经济决策实施却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它还动员了大量的人力,在中国进行了多方面的如对国防资源、经济流通关系等等的战时调查。但迄今为止,兴亚院的全貌还不大为人所了解。同时,作为战时机构,对有关资料有意销毁,也为了解这一史事带来一定的困难。本书根据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国立公文书馆、防卫厅战史室等处保存的史料和一些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调查报告,对兴亚院的成立、活动和作用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该书附录的关于 2000 种兴亚院发行的“报告书”的收藏情况和目录,对于了解兴亚院的活动以及利用这些资料都很有帮助。

发表在《长野县立历史馆研究记要》上的德永英夫的《满洲开拓的经过和来自长野县的开拓民》一文,为揭示日本“满洲开拓”的全貌,集中对来自长野县的“开拓民”进行了分析。指出:长野县从 1932 年 8 月就开始以陆军省正式文件的形式进行招募,也是全日本最早进行分村、分乡组织开拓团的县,人数最多时达 3 万余人,占日本全国“开拓民”的 12.5%。这种情况,除了在所谓爱国的

“官民一体”的口号下进行动员外,与当时长野县的经济形势恶化,特别是占县经济 70% 的蚕丝业受到致命打击密切相关。1945 年战争结束后,开拓团民只有一半也就是 11 万人回到日本,其中长野县占 1.6 万人,1.5 万人则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另外,白井胜美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和日本(1935—1937)》(《外交史料馆报》第 16 号),荻原充的《1930 年代的日中航空联络问题》(《现代中国》第 76 号)等文,也从不同角度对中日战争期间的两国关系进行了探讨。

3. 战时遗留问题研究。西成田丰的《中国人强制连行》(东京大学出版社),把中国人强制劳工放在关于战时和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关系中特别是“断绝说”和“连续说”的学术语境中,进行严密的学术分析。特别是作者利用搜集到的 111 份“华人劳务者就劳颠末报告书”和 1946 年外务省管理局的“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对日本实行强制劳工的政策以及军部、兴亚院、企业、业界团体、各种强制组织在其中的作用,和到日本以后的登陆与分配到各个工场的过程、使用强制劳工的产类别、强制劳工的出身年龄家庭职业、强制劳动情况、管理组织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同时,对劳工的生活条件、死亡者的业种、企业和死亡数、死亡原因也进行了数据分析。此外,还从各个方面同朝鲜的强制劳工进行了比较,指出不但劳动的业种有所不同,劳工的来源也不一样。朝鲜主要是来自南部的农民,而中国的则是以八路军等被俘军人为多。对朝鲜人采取的是同化政策,对中国则是隔离政策。由于待遇不同,特别是粮食供应不足,中国劳工得病死亡较朝鲜劳工更加严重。作者此前曾对朝鲜劳工作过专门研究,所以其比较具有可信性,也更凸显了中国劳工悲惨的处境。

粟屋宪太郎主编的《中国山西省的日军毒气战》(大月书店),是汇聚以山西省为中心,从 1999 年到 2001 年 3 年间以共同作业方式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的集体成果。指出日军利用山西省多山

地、交通不便和与外界联系不广、不易被发现的特点,在抗战期间频繁地使用毒气。他们为此多次深入山西各地,踏访当年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收集他们的证言,真实地将日军当年在山西使用毒气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不仅表现出踏实的学术作风,其精神也令人敬佩。

松冈环的《南京战——寻访被封闭的记忆——原参加南京之战的 102 个士兵的证言》(社会评论社),通过参与南京大屠杀日军士兵的口述,把残酷的不可否认的大屠杀事实展现在世人面前。以前关于南京大屠杀,来自日军士兵当事者的证言甚少。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证人出庭的有目击者、日军将校、日本官僚,却没有士兵出来作证,他们的证言也只是引用了极少的一部分。但是,在南京入城之后进行的屠杀和强奸绝大部分是士兵们犯下的,这些人基本保持了沉默,有人甚至极力否认。有鉴于此,1997 年 10 月 10 日到 12 日,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全国联络会会同一些相关团体,开设了南京大屠杀情报热线,收集证言。其后,他们又组织人手进行再调查,尽管有的拒绝,有的被家人中断,他们仍坚持一家一家地访问,被访者达 250 人以上。他们总共用了 4 年多的时间,松冈环为此几乎用去了 4 年来全部的周末和休息日,终于收集到了原参加南京之战的 102 个士兵的证言。该书内容分为“南京陷落以后,在长江边上的集团屠杀”、“南京陷落前后在城内和城门附近发生的屠杀”、“南京陷落后继续进行的屠杀”、“对中国女性的性暴力”、“以征发名义进行的抢夺”、“放火和强制劳动”等部分。通过阅读这些亲历者的证词,结论只能是:任何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的。

笠原十九司的《南京事件和日本人——围绕战争记忆的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柏书房),介绍了美国人如何看待教科书问题和南京事件,分析了为什么日本人会成为加害者、战争所带来的人格

否定和破坏、日本军队的性暴力和日军特性的关系等。同时,揭露文部省充当了维护否定日军罪行者的角色,并对否定派的世代交替和新旗手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的非历史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驳斥。作者认为,为了挽救没落的日本,建设东北亚共同体,对历史应该有共同理解。因此,对于日本的战争记忆,从被害的记忆转换到加害的记忆是必要的,国际的对话也是必要的。在日本,很多像笠原十九司这样有良识的人,正在与逆潮流而动的右翼分子进行斗争,我们应该以各种形式更多地支援他们的斗争。

(三) 俄罗斯的研究

历史学博士 A. 科什金继 2001 年发表《苏日中立条约》、《日本走向大战之路》等文后,2002 年在《历史问题》杂志第 4 期发表了《太平洋战争外交序幕》一文。该文虽主要论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苏美、苏英国绕日本进攻苏联问题,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希望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频繁外交接触,但在有些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有关中日关系的内容。例如,文章指出:1941 年 11 月 19 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局制订了希望与日本延期战争 3 个月的临时协定草案。作为日本撤出南印度支那的交换条件,美国解除其 1941 年 7 月 26 日对在美日本基金的冻结。虽然该协定没有直接表示,但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北印度支那的占领。同时,协定最主要的缺点是根本没有涉及中国的形势。因此,11 月 22 日凯利将协定草案交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和中国驻美大使,希望能赞同美国对日关系的新倡议,遭到了蒋介石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在这些日子里,蒋介石直接致电美国领导人,对美国与日本在临时协定基础上可能达成协议表示担忧。由于中国的反对,同时考虑到英国对中国的立场(邱吉尔在此之前已要求美国在对日关系上采取坚决行动),美国政府最后采纳了财政部长摩根索的个人方案。摩根索的方案与国务院方案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上都更

为具体。但尽管如此,该方案仍没有解决任何问题。1941年12月7日,日本向美国珍珠港舰队发起攻击。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日本在当日对美国 and 英国同时宣战。

又如,文章指出: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的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在会见苏联驻美国新任大使李特维诺夫时表示,希望苏联政府加入反对日本的战争,并提出使用苏联领土向日本殖民地附属国进行轰炸打击的愿望。但克里姆林宫首先感兴趣的是美国对苏联继续提供军火。这再一次表明对苏联政府而言,卷入大规模对日战争显然是不利的。莫洛托夫在1941年12月10日致李特维诺夫的电报中,明确表明了斯大林的立场:“(1)我们不认为能在目前情况下应同日本宣战,而应当保持中立,因为日本遵守着《苏日中立条约》。《苏日中立条约》规定我们要保持中立,而且暂时没有理由不根据该条约履行其义务。我们不认为应首先破坏条约,因为我们自己一贯指责破坏条约的政府。(2)当前,我们同德国进行着艰苦的战争,几乎投入了我们的所有力量,其中包括远东的一半军队。我们认为,如果宣布同日本进入战争状态,在两线作战,对苏联是不明智和危险的。苏联人民和社会不会理解和赞同当前同日本宣战的政策,因为敌人还未从苏联领土上被赶出,苏联的国民经济还经受着巨大的困难。我们的社会完全清楚,苏联方面同日本宣战会削弱苏联抗击希特勒战争的力量,将有利于希特勒德国。我们认为,我们主要的共同敌人仍是希特勒德国。对苏联抗击希特勒德国侵略的削弱,只能强化轴心国的力量,对苏联和盟国的利益带来损害。”

太平洋战争爆发10天后,斯大林的态度有所变化。12月17日他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谈中表示:“当然,日本在远东开始获得了一些胜利,但在几个月后最终必将崩溃。”早在这年7月,苏联与英国签订共同反对德国协定时,斯大林就已向邱吉尔提出开辟

第二战场问题,但苏联的要求在第二年秋天,即希特勒军队在莫斯科遭到失败后才得到回应。日本向美国、英国的进犯,迫使华盛顿、伦敦请求苏联在远东开辟第二战场。而这种请求,显然不排除有考虑斯大林坚持将反对日本的斗争问题与让西方政府在欧洲开辟反对希特勒的第二战场联系起来的成分。

文章最后强调,太平洋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是世界主要国家为重新划分世界,对具有丰富自然资源和人口资源的亚太地区,首先是中国进行经济和政治监督多年斗争的结果”。

(责任编辑:荣维木)

《血肉丰碑——侵华日军滇西暴行与滇西抗日战争纪实》

2003年7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由沙必璐主编的《血肉丰碑——侵华日军滇西暴行与滇西抗日战争纪实》。该书图文并茂,记述和绘制了抗战时期日军在滇西轰炸,投放霍乱病菌、鼠疫菌,屠杀百姓,强迫污辱各族妇女的野蛮罪行;中国军队出征缅甸,怒江阻敌,龙陵、腾冲大捷,盟军美国空军飞越驼峰运送物资,滇西人民支援抗战,战后对滇西抗战史实的资料整理、研究等。